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浦聪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八打雁校区, 菲律宾 八打雁 4200

DOI: 10.61369/SE.2025020031

摘 要：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呈现东中西部效能递减特征，西北边疆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及人才流动等制约因素影响，导致其数字治理水平相对而言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对此，本文通过阐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的特殊性，以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为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进而探究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关 键 词：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

Research on th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Minority Areas

Pu Cong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Batangas, Batangas, Philippines 4200

Abstract： As the Digital China strategy advances, the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have becom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Currently, China's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exhibits a decreasing efficiency from east to west.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s and southwester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re constrain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lent mobility, leading to relatively lagging digital governance levels compared to the more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In response,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using Zhenyuan County in Pu'er City,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se regions and explor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such capabilities.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grass-roots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引言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面临双重矛盾，技术可用性与治理适配性出现失衡，直接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技术工具的迭代，还需破解民族地区特有的治理逻辑。基于此背景，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范畴，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本文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构建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基层数字治理范式，以期为破解“数字鸿沟”提供理论参考。

一、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的特殊性

（一）政治权威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双重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面临着政治权威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双重性挑战。一方面，基层政府需坚决贯彻国家统一的政策法规，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代表国家行使政治权威，确保中央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地实施，这是国家治理统一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

特的政治文化与传统权威结构，基层政府在治理中需兼顾这些传统权威，将其纳入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政治权威与传统权威的有机融合。

（二）治理内容的复合性与敏感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内容治理内容相互交织，且任何一项工作的失误都可能引发民族矛盾或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治理的敏感性。从经济层面看，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偏远山区、草原或边境地带，经济发展相对而言较为滞后，且存在产业结构单

一的问题，基层政府需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就业创业，同时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特色产业，以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在社会层面，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复杂，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基层政府需要针对这一方面进行积极协调，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1]。此外，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基层政府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基层政府必须精准对接各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公平优质且贴心的服务，切实保障各民族群众的基本权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在文化层面，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基层政府需承担起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同时又要引导各民族群众适应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避免文化冲突与隔阂。

（三）治理方式的协同性与适应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协同性，主要体现在基层政府对多方资源与力量的整合方面。基层政府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与上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各民族群众代表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例如在扶贫开发项目中，基层政府需与上级扶贫部门对接政策与资金，联合企业开展产业扶贫，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开展医疗帮扶项目，同时充分听取各民族群众意见，共同制定和实施扶贫方案。治理方式适应性则要求基层政府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与方法。不同民族地区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基层政府需因地制宜，采用符合当地特点的治理方式，避免“一刀切”的做法，以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治理目标的双重性与长期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具有双重性与长期性。一方面，双重性体现在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一般性治理目标，又要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等特殊目标。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不能以牺牲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必须在发展中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维护生态平衡^[2]。另一方面，长期性则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制约，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贫困、教育落后等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就需要基层政府持续投入精力，制定长远规划，稳步推进各项治理工作，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3]。

二、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案例分析——以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为例

（一）5G网络与智能感知体系全域覆盖

镇沅县将5G网络建设作为数字治理的新基建核心，截至2025年已建成697个5G基站，实现县城、乡镇政府驻地及行政村5G网络全覆盖，村民小组覆盖率达90%。高密度网络布局为智慧平台运行提供了底层支撑，古城镇河西村依托中国电信5G网络搭建

的数字乡村智慧平台，整合119路AI摄像头形成全域监控网，覆盖村民小组主要出入口及重点区域，实现人车流动的实时感知与智能分析。2024年，在哈尼族十月年等民族节庆期间，该平台通过人流智能统计功能，精准掌握16万人次游客动态，为当地的交通疏导以及安保部署提供数据支撑，使大型活动期间盗窃和纠纷类警情同比下降37%。此外，在消防领域，镇沅县智能感知设备的部署突破了传统人防局限，建立“视频监控+红外热成像”双模预警系统，对全县重点林区实施24小时监测，通过AI算法自动识别火源点，将火情处置响应时间从人工巡查的2小时缩短至15分钟。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则实时追踪PM2.5、秸秆焚烧等污染源，2024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8.6%^[4]。

（二）“一网统管”重构治理流程

镇沅县构建的数字乡村智慧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整合智慧党建、平安乡村、村务政务、网格化治理等六大功能板块，通过数据中台打通公安、交通、环保等12个部门业务系统，形成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河西村监控数据实时推送至乡镇派出所综合治理平台，为突发事件处置提供可视化支撑。2024年，派出所通过该平台远程处置酒后滋事事件17起，平均处置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40%。另外，平台创新推出的“随手拍”功能，让群众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村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环境卫生、房屋安全隐患等问题，系统自动生成工单派发至责任网格员。在茶王社区环境整治中，居民通过该功能反馈私搭乱建线索23条，社区依托平台数据快速定位违规点位，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专项整治，拆除违建建筑12处，清理垃圾死角8处，使社区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2%，这种“问题发现—工单流转—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有效解决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三）数字工具建立政民互动模式

镇沅县开发的数字镇沅微信小程序，将政策宣传、村务公开、民意采集等功能集成于移动端。村民通过村码即可访问党群服务中心、集体经济、养老服务等八大板块。在碌碁坪村，村民通过小程序查询三务公开信息318次，申请就业咨询、户厕维修等便民服务58人次。特别是针对脱贫户开发的户码系统，整合家庭收入以及医疗保障等12类数据，使帮扶对象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9%，政策落实效率提高60%。除此之外，镇沅县设置的金茶叶积分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村民只需通过完成微心愿、参与志愿服务等行为获取积分，即可在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在2024年“美丽庭院”创建活动中，326户家庭通过小程序提交改造方案，累计获得积分奖励1.2万分，带动庭院绿化面积新增2.3万平方米。镇沅县以“服务—参与—激励”的正向循环方式，使基层治理从政府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共治^[5]。

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的完善，能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实现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投放，为数字治理提供底层支撑。

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数字通信网络体系。基层政府应积极争

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联合通信运营商制定差异化网络建设方案。一方面，在人口聚集区、交通要道、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优先部署5G基站与千兆光纤网络，满足政务服务、智慧旅游等场景的高带宽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偏远牧区、边境村落等信号盲区，采用卫星通信、低轨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便携式终端设备实现网络覆盖，确保基层治理信息实时互通^[6]。

二是打造“一网统管”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基层政府需以“一网统管”为目标，整合政务服务、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等系统，构建统一的数据中台与业务协同平台。通过制定数据采集标准与共享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人口、土地、资源等基础数据的动态更新与跨部门调用。同时，开发多语言版本的移动端应用，支持少数民族群众通过手机办理社保、医保、教育等高频事项，并提供语音导航、图文翻译等辅助功能，降低数字鸿沟对公共服务获取的影响。

三是推动基层治理场景的数字化改造。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需结合地域特色与实际需求，将数字技术嵌入具体场景。在生态保护领域，利用物联网传感器与无人机巡检技术，对草原退化、森林火灾等风险进行实时监测与预警；在文化遗产领域，通过3D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对非遗技艺、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与展示，并开发线上文化体验平台，吸引年轻群体参与传承；在民族事务管理领域，建立民族关系监测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潜在矛盾风险，推动矛盾纠纷的早期干预与精准化解^[7]。

（二）深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

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人的数字化能力建设。深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需立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差异、教育水平不均衡等特殊特性，构建分层分类、多语种覆盖的培训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主体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应用”转变。

第一，开展基层干部数字治理能力专项培训。少数民族地区需制定分层次、模块化的培训方案，针对领导干部重点培训数字战略思维与数据决策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实地考察等方式，增

强其对数字治理趋势的把握；针对一线工作人员，开展政务系统操作、数据分析工具应用等实操培训，并设置模拟演练环节，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实施群众数字技能普及工程。基层政府需联合教育部门、社会组织与科技企业，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普及机制。在中小学阶段开设数字素养必修课，融入编程基础、网络安全等内容，通过课后服务开展机器人竞赛、数字创意设计等活动；在社区层面设立数字技能学习角，提供智能手机操作以及移动支付等实用课程，并安排志愿者“一对一”辅导；针对老年群体，开发大字体、语音播报功能的适老化应用，并通过子女反哺、邻里互助等方式推广使用。

（三）优化数字治理制度与文化生态

一方面，完善数字治理的制度规范与标准体系。基层政府应制定《数字治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明确数据采集权限、使用边界与安全责任，并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对涉及民族宗教、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实施重点保护，同时制定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推动跨省通办等改革落地。另一方面，构建多方协同的数字治理参与机制。基层政府应搭建数字治理议事厅等平台，邀请村干部、宗教人士、企业代表等共同参与数字项目规划与评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决策过程透明化，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开发民族语言版本的数字治理工具，支持企业参与智慧乡村以及数字文旅等项目建设，形成“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技术支撑+社会力量补充”的协同模式^[8]。

四、结语

基层政府要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积极探索出契合实际的数字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探索与实践，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将持续提升，为少数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和繁荣稳定筑牢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伊婕. 数字赋能推进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路径[J]. 中国军转民, 2024, (13): 80-82.
- [2] 毛春合, 宋昊阳.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的优化路径研究——以青海省大通县的实践经验为例[J]. 延边大学农学报, 2023, 45 (02): 103-109.
- [3] 杨新福. 西部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 贺州学院学报, 2021, 37 (04): 127-132.
- [4] 陈纪, 蒋子越. 民族乡村产业振兴的基层政府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安徽省H市三个典型案例的考察[J].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2024, 45(05): 22-30+46.
- [5] 黄蕊. 城市多民族聚居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之我见[J]. 西部学刊, 2024, (01): 21-24.
- [6] 毛春合, 宋昊阳.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的优化路径研究——以青海省大通县的实践经验为例[J]. 延边大学农学报, 2023, 45(02): 103-109.
- [7] 白云鹏.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与对策研究[D].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3.
- [8] 滕悦.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振兴中的政府职能作用研究[D]. 东北林业大学, 2023.